

文/李楠

## 浅析戏曲中的“三月三”

**【摘要】** 戏曲学和民俗学，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，不仅在学术上保持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通相关之处。这里仅从戏曲学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来探讨戏曲与民俗的深厚关系，亦即戏曲演出与节日时令的关系。通过对于“三月三”系列的戏曲剧目的分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戏曲与民俗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。

**【关键词】** 戏曲；民俗；三月三；时令；京剧；剧目

众所周知，戏曲是中华民族艺术大观园中的瑰宝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千百年来传唱至今，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。民俗是一种来自于人民，传承于人民，规范人民，又深藏在人民中的行为、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，与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戏曲学和民俗学，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，不仅在学术上保持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通相关之处。戏曲学是将戏曲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的学科，属于对戏曲艺术的宏观分析，自然离不开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知识。而民俗学是通过传承和对比民俗资料，研究整个民间生活和文化的学科，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生活现象息息相关，也自然牵涉到戏曲学的研究范畴和背景知识。

“世界上任何一种戏剧形态都不如中国传统戏曲与民间风俗关系密切。中国戏曲是在民间艺术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的，又是伴随着民间风俗成熟和发展的。民间风俗为戏曲艺术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，同时戏曲艺术又为民间风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。”<sup>[1] (P240)</sup> 学习研究戏剧戏曲学的人，必须要掌握一定程度的民俗学知识，否则面对戏剧戏曲学中大量的民俗学背景知识就会茫然，不知所措。同样，学习研究民俗学的人，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戏剧戏曲学，否则我国人

民如此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就无法深入研究下去。

本文仅从戏曲学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来探讨戏曲与民俗的深厚关系，亦即戏曲演出与节日时令的关系。“中国的节日时令与戏曲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古人非常重视节日，一是因为节日与原始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，如二月二龙抬头、寒食节、七夕节、中元鬼节等都与原始信仰有关；二是因为古时节日与农事相互关联，农时对社会经济，甚至社会的安定都有重大关系。”<sup>[2] (P36)</sup> 这里主要谈谈戏曲传统剧目中，牵涉到“三月三”的一些经典老戏。“三月三”是汉族及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，日期在农历的三月初三，也称作“上巳节”。相传，这一天是黄帝的诞辰之日，所以，中国自古就有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；三月三，生轩辕”的说法。魏晋以后，“上巳节”改称为“三月三”，后代沿袭，遂成汉族水边饮宴、郊外游春的节日。

昆曲的《桃花扇》既是戏曲舞台上的经典作品，也是明清传奇文学中的名著。在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力作中，主人公有一句唱词“三月三刘浪到了”。本身“三月三”就是春暖花开的大好时候，也是人们心花怒放的季节。这就注定了这个时令与爱情密不可分，因此很多戏曲题材抓住这一时令，挖掘出了很多民间故事。

**作者简介** 李楠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。



京剧中所展现的“三月三”的爱情故事，与其他剧种大相径庭。在京剧中，有两出非常著名的武戏，分别是《蜈蚣岭》和《艳阳楼》，久演不衰。这两出戏里，都有一句相同的唱词，叫做“三月三日正清明”。《蜈蚣岭》说的是好汉武松在三月三日这一天，行至蜈蚣岭时看见一位老汉啼哭，并上前问起情由，得知老汉的女儿在上坟时被恶人抢掠而去，勒逼成亲。于是武松拔刀相助，救出民女脱险。《艳阳楼》说的是高俅太尉之子高登在三月三日这一天，带领着教师爷和家丁们逛庙会，遇见民女貌美，于是强行强夺，并且将其囚禁于艳阳楼。这位民女的兄长见妹妹被抢，一直奋力追赶高登一伙，恰遇梁山后嗣几人，如花荣之子花逢春、呼延灼之子呼延豹、秦明之子秦仁等，于是大家同心协力，救出民女，打死高登，火烧高登的府门，为民除害。这两出戏，既有很多相同之处，也有一些不同之处。相同之处在于，这两出戏都取材于《水浒传》，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，都是伸张正义的故事。不同之处在于，《蜈蚣岭》是一出短打武生戏，主要塑造的是武松这个正面人物形象，突出了武松的侠肝义胆和武艺高强。《艳阳楼》是一出勾脸大武生戏，并且武花脸和武生都可以同唱这出戏，主要塑造的是高登这个反面人物形象，突出了高登的蛮横无理和飞扬跋扈。其实，京剧的传统剧目中，无论是以正面人物为一号人物，还是以反面人物为一号人物，最终都是宣扬正义的，表达了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的思想。这是因为，“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大量剧目还是以忠孝节义为题旨的道德戏曲。忠、孝、节、义从思想范畴讲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封建道德体系，具有多层次的结构。换句话说，即当时属于统治阶级范畴的帝王将相，权豪势要以及依附他们的流氓、地痞、恶棍、无赖和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农民、工匠、商贩、读书人等广大百姓，虽然同受忠孝节义道德观的支配，却因其所持之爱憎态度，是非观念各异，而呈现出不同的道德风貌。”<sup>[3] (P22)</sup>

还有一出京剧叫做《打侄上坟》，也是久演不衰的应节戏，每逢清明时节总有上演。这出戏本是全部《状元谱》中的两个折子，即《打侄》和《上坟》，说的是陈伯愚的侄子陈大官的故事。他是个不学无术、游手好闲的少年，借着叔父陈伯愚开仓放粮之际来领取救济，反被叔父教训一顿，责备他不求上进、自甘堕落。但是陈大官也有一点良心，还去亲生父母的坟前祭奠，于是重念父母的遗愿，痛改前非，立志发奋用功，求取功名。由于全部《状元谱》中最精彩的看点都集中在这两个折子里，所以后世一般只演出这两个折子。戏中，陈伯愚也有一句唱词是：“三月三日正清明”。可见，京剧的应节戏大多在戏词儿中就开门见山地唱出来，给观众以提示。

不仅是作为国粹艺术的京剧有一些“三月三”的戏，很多地方戏更是屡见不鲜。例如：汉剧《断桥》中有词“三月三游西湖春暖如火”、沪剧《顾鼎臣》中有词“三月三，正清明”、沪剧《雾中人》中有词“那一节始于三月三”、淮剧《刘二姐赶会》中有词“三月三天气暖洋洋”、评剧《无双传》中

有词“七月七盼到了三月三”、越调《李天保娶亲》中有词“正月好推到三月三”、越剧《血手印》中有词“三月三半夜三更起盗心黄金抢”，等等。

其中，黄梅戏作为一个在地方戏中影响较大的剧种，有很多描写“三月三”的剧目。例如：《花田错》中，有一句“大不该三月三让你出漏口”；《蓝桥会》中有一句“年年踏青三月三”；《送香茶》中有一句“三月三去采桑母女们两个”。这些剧目都是故事情节简单，充满生活情趣的小戏，也恰好符合黄梅戏的“三小”特征，即以“小生、小旦、小丑”为主的戏。其实，这个“小”，还可以理解成题材上的小，也就是剧情并不牵涉“大”的题目，并不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等大的范畴，而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的小事儿。在这些戏中，小生、小旦、小丑都是年轻可爱的人，男性中既有风流儒雅的书生，也有滑稽可笑的小贩；女性中既有美貌如花的少女，也有年轻守寡的妇女。他们借着“三月三”这个日子出外郊游，遇见异性，就一见倾心，私定终身。从艺术形式上说，类似黄梅戏的这种地方戏，旋律清新明快，朗朗上口，唱词也通俗易懂，并且句数很多，非常适合表达这类情感。如果换到了京剧，就显然格格不入。因为京剧的独特的唱腔结构不适合冗长的唱词，更不适合用复杂的程式化表演去展示男欢女爱。

以上谈论的都是戏曲中的传统戏，那么在戏曲的现代戏题材中，有无“三月三”的戏呢？有，但是不多见，因此显得格外难得。有一出创作于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评剧叫作《红色联络站》，这出戏根据歌剧《三月三》改编而成，描写的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地下党同志配合红军在白匪统治区建立红色联络站，进行反“围剿”活动的故事。剧中，主人公一出场，就唱“三月里来三月三”，而故事的情节和唱词的内容都与传统戏中的“三月三”毫无关系，完全是革命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。社会发展到了今天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出红色剧目具有很深的时代烙印，属于那个众所周知的年代的艺术产品，但是也有其一定的艺术价值，毕竟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做了探索。这就是戏曲事业中反复提倡的“旧瓶装新酒”、“移步不换形”。

总之，通过对“三月三”系列戏曲剧目的分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戏曲与民俗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。我们也有理由相信，随着戏曲学和民俗学这两门学科不断发展，它们之间的渗透会越来越深、越来越多。■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王安葵，刘祯.东方戏剧论文集[G].成都：巴蜀出版社，1999.
- [2]朱文相.中国戏曲学概论[M].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4.
- [3]何丽.纵谈传统戏[M].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2.